

农业学大寨 大干促大变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农 业 学 大 寨 大 干 促 大 变

本 社 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农业学大寨 大干促大变

本社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印张3.6875字数70,000字

1974年1月第1版 197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16110·9 定价：0.22元

毛主席语录

农业学大寨

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。

以农业为基础、工业为主导

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。

目 录

- 一、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
陈永贵同志的讲话(摘要)……………(1)
- 二、在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
陈永贵同志的讲话(摘要)……………(21)
- 三、在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
陈永贵同志的报告(摘要)……………(40)
- 四、在农林部、中共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报告会上
陈永贵同志的报告(摘要)……………(63)
- 五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
大批大干促大变……………中共昔阳县委员会(85)
- 六、大寨迈大步 灾年夺丰收……………
新华社通讯员
新华社记者(104)

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

陈永贵同志的讲话（摘要）

同志们：

这次我到甘肃省，是学习的好机会。正是在甘肃省委贯彻十大精神的时候来的，正在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，有来自各方面的代表，更便于我学习。虽然我来的时间不长，跑的地方不多，但学到了宝贵的经验。把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带回去，在山西开花结果。

同志们，今天下午先向各位代表谈谈大寨走过的路子。

还是从根儿来吧，从互助组时期说起吧。

大寨一九四五年秋季解放，一九四六年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。那时候具体情况是这样：一个是土地赖，土地都在山坡上挂着；再一个，就是没有耕畜，耕畜被日本帝国主义吃了肉；再一个是劳力少，我们六十多户人家，共一百九十口人，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杀死我们四十二个青壮年；再一个就是农具也少，农具都被日本帝国主义烧光了。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“三光”政策的结果！那么，我们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。刚开始组织互助组，分成了两派：有劳力跟有劳力的户组织在一

起，人们叫好汉组；老的和小的组织的一个，叫老幼组。这个组有五个年老人，最年轻的六十岁，其余都是六十以上到七十多岁的。娃娃有七个，最大的只有一个，十四岁，其余都是十二岁、十岁，还有八九岁的。这个老幼组一组织起来，好汉组就攻击说：老的上不了马，小的扯不开弓，有好戏看啦！可是，老的给地主扛了一辈子长工，他有经验，对农业这一行熟悉。小的都是被日本鬼子杀死了父、兄，他们有民族恨、阶级仇，不要看人小，志气可不小。这些老汉娃娃们，还有个不服气，说：不要看你劳力好、土地好、耕畜好、工具好，你不要看我们老的老、小的小，土地又赖，耕畜又没有，工具又没有，就看听谁的话，跟谁走。老的有经验，小的能长大，只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，路子走不差。老的把这些娃娃当成自己的孩儿看待，娃娃把老的当成自己的大人对待，互相尊重爱护，团结得很好。这样，老幼互助组战胜了好汉互助组。这个好汉互助组，名互助实单干，春来夏散秋不见。结果，老幼组看了好汉组的戏了！这个老幼组就是大寨成长的基础。到底是路线决定一切，还是条件决定一切？不是很清楚了吗。我们不能用自然条件掩盖路线。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回忆。每一次革命大批判，我们都要回忆这些问题的。你不回忆这些事情，怎么能比出来什么是正确路线，什么是错误路线。有比较才有分析，才能认识清楚。这样回忆对比，看我们走过的道路，那些对了，那些错了，有利于开展革命大批判，有利于提高路线觉悟，有利于教育群众，也教育我们自己。

这个互助组，到一九四九年就发展到了四十九户。一九五三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就以这个老幼互助组为基础，娃娃们成了骨干力量。县里批准我们办三十户的农业社，户多了怕办不好。那么，多下的十九户该怎么办呀？谁也不愿意出去搞单干！那只好说“假”话，明里是三十户，暗里是四十九户。人心齐，确实办得不错，到秋天农业社亩产二百四，互助组亩产一百八，单干户亩产一百六。农业社丰收了。我们准备扩大社，开大会总结农业社的优越性，表彰先进，使大家早日加入农业社。可是，有个反革命分子在会上跳起来说：“你们农业社亩产二百四就大惊小怪，我这个单干户，一亩地产了三百多斤，我还觉得没有什么。”这一下在大会上泼了凉水。有的人也说：“是不是单干比农业社好呀？”不能让反革命这样嚣张，要想办法。我们就开支委会商量。恰好这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，任务刚下来，还没有宣布。商量好了，就到大会上说：农业社丰收了，互助组丰收了，单干户也丰收了。今年国家给了我们四万二千斤的征购任务，还不能超额完成吗？这一提，那个反革命分子，就跟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栾平一样，打开自己的嘴巴了，他说了实话：

“我是有意破坏农业社。我不仅不想加入农业社，连互助组也不想搞。我的产量是假的，连我那秸秆过了秤，也没有三百斤。”这一下，我们贫下中农又掌握了主动权：亩产三百斤，是你自己报的。就按你报的数字给你派征购，这个会上不能给你下产；要下产，大寨这六十多户人家，你挨门挨户去恳求吧。逼得这个坏家伙没有办法，第二

天，确实登门上户，户户不漏，到处恳求救救他。他破坏农业社了，走到那一户也挨斗争、挨批判。反革命搞破坏，让反革命自己请罪，做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通过整反革命，也教育了贫下中农。在当时，有一种议论说：

“地主没地了，富农不富了，阶级斗争没有什么了。”事实摆在眼前，不是没有阶级斗争，阶级敌人并没有睡大觉啊！每发生一次阶级敌人捣乱破坏，我们都不放过去。工作再忙，不能忽视搞阶级斗争。这样，正气就逐渐上升了，邪气逐渐下降了，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比较顺利地向前发展了。

农业社没有被地富反坏破坏了，反而旗帜更加鲜明，成绩更加突出了，广大社员的决心更大了，巩固、壮大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办法更多了。这时候，“暗会计”也起了作用。“暗会计”是一个没有入社的富裕中农，我们社里的场在他的房前边，他藏在一边，每天晚上给我们记帐，社员分了多少，入库多少。他出来起作用了，给咱们公布数字了，他登门上户对那些没有入社的户说：社员的粮食比单干户多得多。他当了宣传员，动员大家都入社。我们还没有进行很好的发动，工作还没做到，报名入社的户就这么多，在一九五三年冬天，全大寨合作化了。

这时，我们党支部就因地制宜来彻底改变大寨的贫困面貌和不好的条件。条件不好就改造条件嘛！你不改造，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，天上会掉下来吗？它自己会跑出来吗？你要改造它嘛！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，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，你还不能改造它！于是，我们制

订了一个十年造地规划，要彻底改变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。大家都熟悉，这不是小面积，是一千多亩的面积。七沟是干河沟，河沟里一分地也没有；八道梁都分布在一面坡上，土地都在这坡上挂着；梁上也有点地，都是跑肥、跑土、跑水的“三跑田”。这里解放以前产量很低，一亩地都是几十斤，碰着好年景，一亩地产个百十来斤。我小时候记得大寨最多产过八万斤粮食，那就是大丰收年。

十年造地规划，贫下中农非常拥护；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坚决反对，他们叫嚷说这是“胡来”，说条件还能改变？要能改变，旧社会早就把它改变了。他有他的理由，说人要走路，水也要走路，人有人路，水有水路。过去人常说：人不和水斗，鸡不和狗斗。人有多大本事，你们敢跟龙王爷搏斗！贫下中农起来说话了：什么龙王爷、马王爷，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也不过是个纸老虎，斗一斗怕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要斗！这时候，我们就提出来，要下最大决心，非治好不可！因为这些地富反坏害怕治理坡地、沟地、梁地，我们就非治理不可。这也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，我们就要拥护。已经订了的规划，就必须实现。要是实现不了，那不仅是经济损失，也是政治损失。从党内到党外要坚决执行这个规划。大干了十年，规划实现了，成绩显著，毛主席路线也落实了，愚公移山在那看得明显了。它阶级敌人再钻空子、再破坏，没有它的市场了，没有它活动的余地了。他何时破坏何时斗，丝毫不能放松。

开始治沟的时候，没有经验，也失败过。三战狼窝

掌，就是失败了两次。就举这一条沟吧，这是最长的一条，三里长，来水面很大，沟又窄，治理费力气。把大家发动起来，干部带头，治理了。可是第二年一场洪水，冲得光光的。这时候，地富反坏跳出来反对；就连我们贫下中农中有些思想不健康的同志也不满意了：这是干啥？一冬劳动一水漂，千日打柴一火烧，作为教训，可再不要干了！再不要干了，还是要再干？我们再干就要找到第一次失败的原因。有的说，根基浅，石块小，冬季施工，工程质量不高。这倒也是个道理。第二次又开工，根基深了，石块大了，质量高了，治了以后，第二年又一场水，冲得光光的。这一下，地富反坏当然反对，贫下中农也有动摇了的，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：群众意见提的对，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！还要再搞？“群众？”你把界限划清一点，群众里头包括了谁？下去开了不同类型的会，看究竟谁反对，那方面占的比重大。党员会呀，青年团会呀，贫下中农会呀。从各种会上的情况来看，贫下中农中个别思想不健康的有点意见；反对的还是地富反坏。这样，弄清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必须听群众的反映，接受意见。看问题、做事情，都要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，不要一概而论，都说成群众。那样，会掩护了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，辨不清是非，混淆阶级阵线。这是又一次教训，这就又学会了怎样分析问题，用什么观点、什么思想来认识问题和讨论问题。这样子，第三次又上马了。找出了第一、二次失败的原因，第三次治理就有了经验。过去治理都是直坝，第三次完全变成弓形坝了，能承受洪水压

力。嗨，第三次成功了。如果你第一次不想干，第二次失败就更不敢搞了，那还有什么狼窝掌地呢？狼窝掌又经过去冬今春的建设，就是大搞搬山填沟造平原，增加了五十亩耕地，现在就这一条沟的粮食，足够大寨大队全年吃。如果我们还种着大寨原来那山坡地，不用说高产稳产，就低产也不保险，遇到天旱，你不吃国家的供应粮吃什么呀？正由于这样大抓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整整二十来年稳产高产啦。每年从收了秋到第二年播种，至少有五个月时间，能开展农田基本建设。这五个月劳力非常集中，没有其他事，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来打歼灭战，年年搞，年年有成绩。毛主席的农业“八字宪法”里“土”是首位，冬天正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大好季节。大部分地方至今过冬闲，在大寨早已不过冬闲了，从一九五三年办农业社，至今根本没有冬闲，把冬闲变成冬忙了。“只有冬天忙，秋天才能多收粮。”这是大寨贫下中农的口号。过去给地主扛长工，冬天冰冻三尺不能给他多干活，他饭也不想给你吃，不用说你挣钱了。他就不要你了。过一个冬闲，冻饿死多少人呀！回忆了过去过冬闲的苦，提高认识了，把过冬闲变成现在的过冬忙，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。全力以赴搞五个月，你想那要干多少成绩！这样说着容易，做起来相当不容易。谁来带头干？大寨贫下中农说得好：“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”我们支部成了火车头啦，又要工作，又要劳动，到底以哪个为主？还是参加劳动为主。不能借口工作，放松了体力劳动，但也不能因体力劳动放弃了工作，缺了那一个也不行。要想把工作做得扎扎

实实，要想取得群众信任，得到群众拥护，只有跟群众在一起参加劳动，同甘共苦，群众也爱护干部了，干部也看到了群众的疾苦，互相关心，互相促进，团结战斗，就无话不说了，有什么工作还做不好呢？

就说我们大队长贾承让，在旧社会上过三个月的学，一九五三年办社时，选他当了会计。开头，算也算不了，账也写不清，可是群众拥护他，说我们这个会计手脚清，不往口袋里装，不往家里拿，没有跑邪道。他不是借他这个干部的名东游西逛，他是实实在在参加劳动。他的业务，利用休息时间，晚上、中午呀，就作完了。他跟社员一样出勤，样样会。我们给他补贴四十个工，他自己参加劳动所挣的劳动日分下的粮食、钱和各种物资，除家中五六口人吃穿用以外，还有剩余的。所以，他就不靠这四十个补贴工。这样群众就拥护他了，都非常满意。就选他当了大队长，这就是要想巩固壮大集体经济，必须要干部参加劳动，这一条在大寨来说是比较过硬的，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。和群众一起干活，在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经验，指挥生产头脑清醒不转向，很少犯瞎指挥。这样，干部的威信也就有了，群众也信任了。另一个体会，就是干部不怕犯错误，但怕有了错误没人给提意见。大寨这个问题处理的比较好，我今天对你有意见，及时给提出来，你改得快，工作顺利，成绩大，威信还能低了？有的人怕提意见降低了威信，或者你要给他提嘛，还得讲究什么场合呀，条件呀，提的过份了就麻烦。大寨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只要群众给提，不管何时提出来都接受，是错误马上改，改了

效果就好，成绩就大，群众就满意，自己的威信就高。不是群众给干部提意见丧失了干部的威信，只怕干部不接受群众的意见，丧失自己的威信。你要去大寨看，就分不出那是干部那是社员，社员也是干部，干部就是社员。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走群众路线，深入调查研究。正由于这样，大寨干部比较稳定，相对的稳定。土改时的老同志，除个别因公牺牲外，都还在一起工作，没有一个掉了队，没有一个垮下去，又层层培养了一大批新干部、青年干部、妇女干部。所以大寨能有一个长期的打算，五年、十年的规划，在完成任务的时候，群众上不来，干部就带头，既抓住眼前，更考虑到长远，就是因为干部稳定。干部如不能相对稳定，这些长远规划和长远打算就没有信心去完成。干部相对稳定，好处很多，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，经验教训丰富，对实现长远计划的决心大。他想的尽是怎样搞好工作的办法，就没有什么个人考虑的问题啦。大寨贫下中农说：这个集体经济所有制好，使人们能够真正树立集体主义、思想革命化。思想不革命化，就尽想个人事情，那就复杂化了。大寨如果没有个思想革命化，现在到大寨参观访问的外宾很多，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的同志参观，对外、对内、对上、对下，那么多的事，都靠干部来抓，那可糟啦，你不知抓啥，你啥也抓，啥也抓不成。老实说，大寨那一系列工作，基本上都让群众掌握起来了，你干部在不在一个样。在大寨除了地富反坏以外，没有一个社员吵工分高低，嫌苦嫌累。因为有了思想革命化，他考虑革命事业多了，考虑集体事业多了，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

少。

改造农业基本条件是很重要的。那么，大寨改造了这么多年，是不是潜力没有了呢？潜力有，再搞它几百年也不能没有。这是在近三年我们所看到的。过去治理的七沟八梁一面坡，现在又重新治理了。为什么要重新治理呢？已经治理成了高产稳产田，再治不是把肥沃的土壤破坏了，不是这里有些地方说：要搞水平梯田，两三年不增产了？不是两年三年不增产，而是当年就要增产。这一点我们已经做过了。近三年来，大寨搬山造平原。什么叫搬山造平原？就是过去那个沟已经治了，中间一个一个土山，有的大一点，有的小一点，两边的沟地，坡度很大。近三年来，就把土山挖成洞，放进炸药（大一点的能放它一两千公斤，小一点的弄几百公斤）。一下爆炸后，用推土机推平。然后再从远处运来石块，打起石坝。后底沟是一九五三年开始治理的第一条沟，它包括三条小沟，治了以后，扩大到二十亩耕地。可是到了一九七一年，又重新治理，把三条沟连成一条沟，中间的土山都搬掉，耕地扩大到八十亩，增加了六十亩，当年就种了高粱，每亩平均收了一千斤。这不就六万斤！当年都能产一千斤，你还能说三年不增产？问题不在平田整地破坏土壤，而是在于你没有考虑要当年增产，你从开始就考虑三年不增产，这事不干也不行，上头赶，底下追，闹点形式算了，当然是不会增产的。如果把肥土层破坏了，你就必须增施农家肥料，或调整作物品种。

大寨经过一个冬春的时间增加了六十亩好地，这是为

集体经济创造财富，也是永久性的利益，这是一九七一年搞的。一九七二、七三年就更大胆了，大头山也敢爆破它，狼窝掌、老坟沟也搞了。这三条沟，由三、二分一块，变成二十亩到三十亩一块了。那就是因地制宜进行了重新治理！说因地制宜，就是需要大块就大块，需要小块就小块，不是死搬硬套，硬拿人工搞大块。大寨三年增加了一百亩耕地，光这一项今年最少也拿它十二万至十三万斤粮食。怎么能说平田整地三年不增产呢？当然，用镢头刨下来土不象炸药爆破的。但是你刨下来以后，多上肥料，把它熟化不行吗。你不熟化，刨下啥就是啥，当然不可能多长庄稼了。

这是三年增加一百亩地，这一项措施就增加了十多万斤粮食，再加其它措施，今年大寨大队每一口人平均两千多斤粮食。如果没有这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改土工作，这一口人两千斤粮食是上不去的。连续抓了二十多年农田基本建设，二十多年来高产稳产，没有因灾吃过国家返销粮，也没有因灾少卖过一斤余粮。比如说一九六三年，这是灾害最严重的一年，不仅冲了土地，而且人们的住房百分之九十七都冲掉了，路也没有了，整个大寨都变了，敌人高兴极了，地富反坏说什么：这下大寨今后不会再有人参观了，大寨红旗从此就倒了。这一回国家什么都得给吧！如果国家不给大量的支援，大寨还得逃荒。这“逃荒”二字引起了大寨贫下中农的反感，这就回想到旧社会了。旧社会遭灾，不仅逃荒，还要卖儿卖女，妻离子散。在毛主席、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，

你想让我再逃荒，这就说明敌人在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。就用阶级分析、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来对待灾害带来的损失，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靠自力更生的方针，战胜灾害，给阶级敌人迎头打击。你说国家对大寨受了那么严重的灾害能不关心？粮也给，钱也给，物资也给，并且已经派人派车把粮、钱、物资送到大寨大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寨的贫下中农让开车的、赶马车的同志吃了饭，让他们把国家给我们拨来的东西仍旧拉回去，支援比我们受灾更大、经济薄弱的大队。拉走了，地富反坏是怎么讲哩？

“这大寨干部要不得了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人家送上门来了，他不要，就是为了当模范。”他也对症下药哩！给你点火，这火是容易点起来的，要是贫下中农没有较高的路线觉悟，这下可麻烦了。可是，大寨的贫下中农说：我们战胜灾害，不是靠物资支援，是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；不要这些物资是对的。群众力量是打击敌人最有效的办法。很快来了一个扶苗、加肥、加工，夺得了粮食丰收，带来了“三不少”：口粮不少，卖粮不少，储备不少。有了毛主席的自力更生的方针，就什么也不少了。这样不仅锻炼了群众，更重要的是考验了干部，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，看你能不能想出办法来战胜困难。在当时还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先治坡呀，还是先治窝呀？“窝”就是房子，“坡”就是地。如果要先修房，不恢复土地，不抓田间管理，住上好房没有粮，问题就更大；抓住粮食，修房问题、恢复土地问题就有了力量了。最后，按群众意见办事，先治“坡”，后治“窝”，五年恢复土地，十年